

缘——丰子恺与宗教

孙莲莲, 邹红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丰子恺以画闻名, 其文也颇为不俗, 然而, 不管是文还是画, 在其中都贯穿着一种内在的神韵, 也是丰子恺整个创作体系的精神核心, 我们可以将它用一个字概括, 那就是缘。这种缘是丰子恺作品的由来, 又是丰子恺作品的归结所在, 既是因, 也是果。它与宗教密切相关, 但却并不是宗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中的单纯再现, 而是丰子恺综合了他全部的人生经验来探讨人生终极价值所得出的深刻领悟。

关键词: 丰子恺; 缘; 宗教; 佛; 道; 人生

中图分类号: I206; J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6)01-0026-06

喜欢丰子恺的朋友都知道, 丰子恺的散文集叫做《缘缘堂随笔》, 它是以丰子恺的旧居缘缘堂命名的, 那么, 为什么叫缘缘堂呢? 这里面还有个典故。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 丰子恺同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租的房子里, 有一天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他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 团成许多小纸球, 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 拿两次阄, 拿起来的都是“缘”字, 于是就决定给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缘缘堂”, 并请弘一法师题写了横额。用丰子恺自己的话说, 这就是缘缘堂“灵的存在开始”。^{[1]198}事实上, 我们决不能把缘缘堂仅看作是一个居所的名字, 丰子恺的缘缘堂确实是有灵的, 不仅名字的来由遂了这个“缘”字, 而且这个“缘”字, 如一条丝线, 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可以说, “缘”是丰子恺作品的精气所在, 是所有作品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凝聚点。不管是文还是画, 都是有缘而来, 聚而成缘。在静僻的路旁的杂草间偶然拾得的一个大钥匙^{[1]173}, 从十年前堆塞着的一箱旧物里偶然翻检出的一把油画用的调色板刀^{[1]174}, 有幸为邻的街坊, 旅途中偶遇的路人, 只要有缘进入生活, 令作者悟到了某种意义并提起注意的人、事、物, 都可以记上一记, 画上一画。马一浮先生为缘缘堂题的一首偈, 可谓切中核心。“能缘所缘本一体, 收入鸿蒙入双毗。画师观此悟无生, 架屋安名聊寄耳。一色一香尽中道, 即此xx非动止。不妨彩笔绘虚空, 妙用皆从如幻起。”^{[1]199}说万事皆由因缘而起未免会令人觉得虚无, 其实我们不妨把“缘”理解为丰子恺作品的精神内涵。那么这所谓的“缘”究竟是什么?

丰子恺说, “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 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 可说是我的一种

习性。”^{[1]138}可见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是丰子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而道德理想最终都归结于人的完善, 人生论也是宗教伦理道德思考的核心内容。丰子恺的一生可谓与宗教结缘, 密不可分, 可以说, 宗教对人生的深切的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丰子恺对人生的思考。

佛教自东晋以后便已渗入孔孟儒学。童年的丰子恺, 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 加上祖母信佛, 自然不免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出家, 也可以说是丰子恺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位他颇为尊敬的老师的佛学思想,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丰子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乃至他的皈依佛门, 都与之不无干系。那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与丰子恺关系最为密切的佛教的人生态度。

佛教认为, 在世间众生当中, 人最有灵性, 却也更容易被幻象所惑, 被贪、瞋、痴等妄念所迷, 因而人生总是充满着痛苦和烦恼, 无法获得真实的幸福。释迦牟尼悲悯众生遭受的苦难, 就创立了佛教, 立志拯救苦海中的众生, 把他们渡到幸福的彼岸。佛教伦理道德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积极价值的一个根本思想是慈悲。《大智度论》说: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一切佛法中, 慈悲为大。” 佛家所谓慈悲, 是慈与悲的合称。慈, 意为慈爱众生, 给予他们快乐。悲, 是同情众生之苦, 视众生之苦如同身受, 并积极救济拔除其苦。而这种仁爱众生的慈悲气质, 在丰子恺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肉腿》就描写了运河岸边的普通农民靠着两腿的力量, 同火热的太阳争水的一幕。文章歌颂了他们的抗争精神, 却也悲悯于这既不“利己”, 也不“利他”, 只能白白耗费辛苦的无奈的选择。佛教的“悲”, 并不是简单的悲天悯人, 而是以众生所

收稿日期: 2005-10-11

作者简介: 孙莲莲(1981—),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E-mail: lianlian_sl@163.com

受诸苦为己身受,与众生受苦同心同感,故称同体大悲^{[2]285}。丰子恺在文末写道:“我的心情由不快变成惊奇;由惊奇而又变成一种不快。以前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1]122}这种以己度人的观念,可见佛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的根本宗旨是求得人生痛苦的解脱。虽然小乘佛教只注重个人的自我解脱,自我觉悟,把自身的道德修养视为修持的根本,大乘佛教则追求所有人的共同解脱,并把众生的解脱作为自我解脱的前提条件^{[2]285};但是,不管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把解脱作为修行的核心和根本目的。然而,佛教的这种解脱,即其所谓的成佛、涅槃云云,是一种对现实苦难、现实生活、现实生命的终极超越,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但这种解脱却是不具现实意义的。它夸大了人生痛苦,否定了现实生活,把现实生活看作是通向天国的手段,把永恒与完善归结于绝对的超越,只是寄希望于来世。也就是说,它完全抹杀了现实人生的积极价值。

然而,从丰子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人生态度并不是这样虚妄的。在丰子恺这里,人生并不总是苦的,而是充满了情趣。他虽然皈依佛门,却不拘泥于宗教的教义或条规。他不会把经文教义奉为圣典逐条铭记,也不会把清规戒律当作至高无上的精神纲领谨遵不违,在他看来,“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1]216},也尽可以拿吃肉来打趣,笑“食肉者鄙”^{[1]469}。在回忆儿时往事的文章中他写道:“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作者注:指养蚕、吃蟹、钓鱼)。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1]26}但从中却感受不到丝毫诚惶诚恐的忏悔语气,反而有一些怀念、珍惜甚至善意的幽默和调侃。由此可见,相对于单纯的宗教的超越,丰子恺更加关心现实的人生,重视人生之乐。毫无疑问,丰子恺是喜欢人的,他的作品明明白白地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中国画以风景为主,但丰子恺却“特别喜欢画人物”。^{[1]394}即使是画诗词的,也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其中内蕴的人的存在。文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写儿童的,写风俗的,回忆旧事的,写游记的,以及读书随录统统都满溢着人的影子。我们说过,丰子恺从小即受到正规的儒学教育,因而儒家视人为万物之灵,重视人伦,强调群体和谐、社会康富的思想自然也影响了丰子恺人生观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他对佛学做了一番新的阐释,他说:“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对物则憬憬爱惜,对人

间痛痒无关,已经是循流忘源,见小失大,本末颠倒的了。”^{[1]217}在佛家众生中,他特别强调人的重要地位,强调学佛最根本的是要爱人,而爱人正是儒家所谓“仁”的精华所在。既然人成为了丰子恺思想的重心,那么他关心的自然不会是来自世虚无缥缈的幸福,而是现实的人生,人生如何才有意义,才会真正获得幸福如此这般的问题。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佛教对于如何超越现实,解脱苦难的关注,在丰子恺这里变成了对现实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讨。

在丰子恺的漫画和随笔中,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隔壁店里衣衫褴褛的穷苦小工的颓唐无计,也有封建礼教压制下的平头百姓家庭的辛酸,普通民众在苦难的生活中挣扎,而富人们却肆意挥霍,纵情声色,战争狂人们打着文明的旗号肆意杀伐。这样的人生都是不幸的,而造成他们的苦痛的是精神上的愚昧、空虚、麻木以及异化。一个大概只有三四岁大的小孩子,坐在茶楼对面的水门汀上,身上一丝不挂,匍匐着,跟着母亲号啕求乞。一个洋装青年走过来,穿着的新皮鞋狠狠地踏在那嫩白的小脚趾上。“小乞丐大哭失声。但那丐婆只管继续号账,没有知道这事。”^{[1]114}只管金钱,不顾亲情,这样麻木的人性,曾经令作者深感痛心。而战争带来的惨象,则令他更加愤慨。“禽兽尚且如此(作者注:知道爱护同类),何况于人。”^{[1]236}诚然,历史车轮的前进为我们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仍然有人因为执著于俗物而禁锢了自己的精神,“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象人,倒象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器、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1]454}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精神不改变,永远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生。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以人的完善作为生命的内在追求的。并强调说,“这个完善不是在存在的层面上的生活的充实与幸福、肉体的无缺陷、寿命的长久,而是在超越的层面上的德性的完美、本性的自足、生命价值的永存,一言以蔽之,是本质的完善。”^{[1]263}这种观念也切实影响了丰子恺的人生态度:要真正达到人生幸福的目的,不得不首先在精神上达到自由和完善。他说,“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体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1]213}他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向善,同时又强调,“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

忍心不可不戒。^[11216]由此可见,护生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藉由三世因果在来世得到好报,而只是为了获得和谐幸福的人生而进行的精神革新。

那么怎样才能从精神上实现完美人生呢?首先要做回真正的人,即还原善良美好的人性人情。丰子恺认为,美好的人性人情是人生的美德。他在《辞缘缘堂》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入山打猎,远远看见一只大熊坐在涧水边,他就对准要害发出一枪。大熊危坐不动。他连发数枪,均中要害,大熊老是危坐不动。他走近去察看,看见大熊两眼已闭,血水从颈中流下,确已命中。但是它两只前脚抱住一块大石头,危坐涧水边,一动也不动。猎人再走近去细看,才看见大石头底下的涧水中,有三匹小熊正在饮水。大熊中弹之后,倘倒下了,那大石头落下去,势必压死她的三个小宝贝。她被这至诚的热爱所感,死了也不倒。直待猎人掇去了她手中的石头,她方才倒下。猎人从此改业。”而且在故事后面用括号标注:“我写到这里,忽把‘它’改写为‘她’,把‘前足’改写为‘手’。排字人请勿排错,读者请勿谓我写错。因为我看见这熊其实非兽,已经变人。”^[11225]在《敬礼》中他又讲了个两只蚂蚁的故事。“我”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不小心碰伤了一只蚂蚁,“我”不忍将它捻死,就任它挣扎,管自做自己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吃惊地发现又来了一只蚂蚁,一个“救伤者”正在衔住了受伤者的身体而用力把他拖向墙壁方面去。”虽然“这救伤者的身体不比受伤者大,他衔着自己同样大小的一个受伤者而跑路,显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来休息。”但既然“发见这个同伴受了伤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劳力,不辞艰苦,不顾冒险,拚命地扶他回家去疗养。”作者深深赞叹“这样藐小的动物”,就“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11345],于是在“他”字之后附注“排字同志注意,以后不用它字了”。在这两个故事里,作者歌颂了亲情和友爱这样天然纯净的情感,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作者是用把动物当作人来描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样的赞美之情的。在作者看来,真正的“人”的精神与品格,是最为高贵的情感,即使是动物有了这样的情感也是值得敬佩的,而那些被金钱所左右,被欲望所蒙蔽和异化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人,因而他们每天只能在焦虑、麻木和浑噩中度过。所以说,要获得幸福的人生,必须首先还原为真正意义的人。

然而,在物欲横流、各种纷繁芜杂的观念与现象迷人心窍的世界,要做回真正意义的人并不意味着光是说说就可以了,还要进行一定的修行。那么,要如何修行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

对丰子恺的影响了。《华严经》是佛法的大全、佛教各系思想的集大成,也是弘一法师佛学的核心思想^[343]。他认为,要想表现创造出种种生命,就该以普贤菩萨悲愿的精神为主,再以文殊菩萨的智慧精神为宾,也就是要透过悲智双修,才能悟入法界。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他所谓的“悟入法界”理解为得到完善幸福的人生。那么,我们就先来从“智”说起。要想人生幸福,必须要有“智”;佛家称为“般若”,“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执著我相,也就是空。所谓空,就是不执著于“空”或“有”,其根本办法是“无我”,一旦“无我”,则能修少欲,可以悟证“无为”之理,而得身心自在。这就是佛教思想中的“般若空义”。所以,在精神上达到“空”的境界是幸福人生的前提。

丰子恺信缘。抗战时期,他拖家带口、挈妇将雏地离家逃难,到了河池,将往贵州,但却找不到汽车,前途将似绝望。只好按旅店老板的建议,暂且住下,等时局稍定再说。一天,老板请丰子恺写了一副对联,因为纸不吸水,只得放在门口等着晒干,没想到却引来了救星。一个喜欢丰子恺作品的汽车加油站站长,看见门口晒着的红对子墨迹未干,便进来拜访,而他正巧有一辆运油的汽车要开到都匀。于是,一副对联的因缘使得丰子恺及家人平安顺利地逃离了战区,被朋友们夸饰为美谈,更誉为“艺术的逃难”。而他却认为,这些都靠的是个“缘”字。“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11230]佛教信缘是讲因果的,有因缘才有果报,而丰子恺关心的却并不是这个。他并不迷信,曾有一老友要为他算命,他不好推辞,却自思“此乃妄人,不足道也”,更感叹于“吃江湖饭的”之“能言善辩”。^[11472]信缘只是达到空的一个前提,只有看清万物因缘无常,纷纭繁杂只是幻象,“我”更是其中一个渺小的部分,才不会被不实的虚幻迷惑,才不会执著我相。他确信宇宙中一定有一册这样的大账簿。“不倒翁的下落,手杖的结果,灰烬的去处,一一都有记录;饭粒与铜板的来历,一一都可查究;旅馆与火车对我的因缘,早已注定在项下;片片白桃花瓣的故萼,都确凿可考。连我所屡次叹为永不可知的、院子里的沙堆的沙粒的数目,也确实地记载着,下面又注明哪几粒沙是我昨天曾经用手掬起来看过的。倘要从沙堆中选出我昨天曾经掬起来看过的沙,也不难按这帐簿而探索。”^[1120]正是这样,他才能不为事物的表象所左右,才能看清无常幻影下的真实,才能与别人无法领略到的生活情趣结缘,进

而体会到生活琐碎的外表下蕴涵着的生命真谛。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空”的境界呢？佛教认为要达到“空”必须破除我执。诸法本来无常无我，是无自性的因缘和合的产物，可人们却执着于现象的真实，对于喜怒哀乐、境遇得失过分在意，强生分别之心，这就是我执。这里的“我”与世俗理解的指称主体自身的“我”有所不同，其本意为呼吸、生命，佛教用以指称实有、实常，自为主宰的实体，相当于自性，但比自性多一个自为主宰的意义^{[2]160}。人一旦有了我执，就必然受到小我之私的约束，易生贪爱、瞋恨、痴迷，如此将失去正确判断事物的理智，容易招致烦恼而造业，所以佛法的“空”就是要“破我执”，因为“我执”正是种种造作的障碍。“破我执”的关键则是要将过去无始劫以来自私自利、卑劣丑陋的坏习惯去除，以真实光明的态度认真行事^{[3]52}。

丰子恺喜欢真率、诚实，不喜欢欺骗、虚伪。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他在《庐山游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在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时发现了一张天桥的照片，好像在断崖上凌空架起了一座“天”桥，觉得有趣，就动身去访。然而却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天桥，开始以为是桥跌落了，后来才恍然大悟是照相技术的诡计。在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这使他“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却也“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1]332}从这一番议论和略带反讽的语气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丰子恺率真的天性。另外，他的随笔中还写了很多日常生活中以礼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假”，比如做客的时候，鞠躬、行礼、让座、敬茶、点烟、添饭，说是优礼，却每每令人感到不快，却还要强装笑脸，与之寒暄周旋，以免被人说是失礼。可以说，没有了“真”的生活充满了烦恼，失去了“真”的人生无法把握幸福。而这种“真”，又与道家要求人们将思想回归至纯净无杂、洁白无暇的状态，抱守未经污染、不落偏见的本然之性，以净化纯化自己的灵魂与人格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道家的理想人格的核心正是反朴归真、保守天真的“圣人”或“真人”。道家所谓的“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指未受到人欲或私欲的障蔽和污染的本然天性，是不含私心杂念的醇厚圣洁，也是一种向原初道德回复的努力，一种保持醇厚和真实的自然倾向。它作为事物的本色和人的本然天性，与“道”同质，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道”的表征或确证。在道

家这里，道德是与素朴、率真、纯洁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觉悟到这一点，才能从道德中汲取自己安身立命的养料，获得自己的归宿和精神寄托。这种“真朴”思想的具体表现则是对赤子境界的推崇。老子视赤子境界为道德的理想境界，主张复归于婴儿，认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量丰富深厚的人，莫过于赤子。赤子无知无欲，精足心和，纯然天真，纯洁无暇，质朴清纯，未受人世情欲污染。他天真自然，“常德不离”；等到赤子长大成人，耳目为外物所诱，心旌为私欲所摇，识见为名利所夺时，则原来的纯性至德、天真率直、素朴清纯就日渐丧失了。因而人们应当蓄养圣德的纯和，“复归于婴儿”。并且把这种赤子境界，看作是世人摆脱苦难袭击、求得心理平和和宁静的最佳出路和途径^{[4]123}。

相同的，丰子恺也极为推崇孩子的精神状态。儿童是丰子恺相当大部分作品的主角。他以他几个年幼的可爱儿女：阿宝、瞻瞻、软软为主人公创作了一大批意蕴丰富的漫画和随笔作品，其中蕴涵的童心童趣也是无数读者和画迷津津乐道之处。很多人都把丰子恺创作这些作品的缘由归结为他对孩子的喜爱，当然，作为父亲对孩子的怜惜与疼爱也是创作动机的一部分，然而更重要的是，孩子所代表的是他所推崇的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就使他对孩子的感情里又有了一些尊敬、佩服和憧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象我们的穷屈？”^{[1]29}世上人们的痛苦和不快都是由人的贪欲、妄念和不切实际的偏执而来的，而最彻底的真实而纯净的灵魂就是孩子。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真”。孩子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1]12}在他们身上，有着“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则“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1]13}他们真率，从不会去掩饰什么，而是“出肺肝相示”^{[1]14}，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想的脸上就表现出来，就是孩子气的任性和耍脾气，也是真情流露的表现，而这一切，则都是美的，可赞叹的。孩子们“真”，因而他们是快乐的，而这种彻底的纯粹的快乐，正是幸福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真”是“空”的前一级境界，也是最接近“空”的境界，更是达到“空”的途径。要达到“空”，惟有先达到“真”，而孩子们正是因为“真”，他们的精神境界才比一般人更加接近“空”。瞻瞻说：“象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

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么?”“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117]这有趣的童言童语,岂不是由“真”而“空”的最佳表征?

唯其真,孩子们才能不受“我执”的干扰,达到自由的境界。“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而且“年纪愈小,他的世界愈大”。^[1137]而这种自由又赋予了他们想象的空间和无尽的创作力,使他们成为“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113]“屋里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贩应该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门口,由他随时去买来吃或玩;房子的屋顶应该统统除去,可以使他在家随时望见月亮、鹞子和飞机;眠床里应该有泥土,种花草,养着蝴蝶与青蛙,可以让他一醒觉就在野外游戏。”可以说在孩子的“词典里没有‘不可能’之一词。”^[1137]而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胡闹,却是洞悉了宇宙间玄妙的道理,多少科技发明的灵思,多少艺术的福至心灵,都来自这些简单却又被掩藏了的智慧。纯真的心带给孩子们非凡的能力,使他们在世间无常幻象中透视到生命本质的真实。“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1129]而这些大智慧则是被“世智尘劳所蒙蔽”的成人所不得见的。

唯其“真”,孩子们才有攻无不克的力量。“他们干无论什么事都认真而专心,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来干。哭的时候用全力去哭,笑的时候用全力去笑,一切游戏都用全力去干。”“见了天上的月亮,会认真地要求父母给他捉下来;见了已死的小鸟,会认真地喊它活转来;两把芭蕉扇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脚踏车;一只藤椅子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黄包车;戴了铜盆帽会立刻认真地变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会立刻认真地变成爸爸。”^[1137]而这种认真,正是成功所必备的因素。在丰子恺看来,“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大人比起他们来,个个都虚伪卑怯”;而“人世间各种伟大的事业,不是那种虚伪卑怯的大人们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们似的大丈夫气的人所建设的。”^[1135]

孩子们由“真”而“空”,进而得“智”,再由“智”而得“力”,这正是通向理想人生境界的途中主体精神完善的过程,是值得所有人企慕和艳羡的。而最宝贵、最关键的是“真”的存在。孩子是天然的、纯净的、不加雕琢的,这是他们“真”的由来。而一般人视为理

所应当的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教却正是对“真”的“摧残”。一次,阿宝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划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道“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母亲听见了,一边喊着“齷齪了袜子”,一边过来把阿宝擒到藤榻上,并动手毁坏了她的创作。而母亲这样做,是“何等杀风景而野蛮”^[114]呀!在《华瞻的日记》中丰子恺又借了瞻瞻的口,对大人强制干涉孩子的真性情表示了不满。在他看来,孩子们的“真”是最可宝贵的,对“真”的破坏是人生最大的罪孽。在《作父亲》中,作者讲述了一个买小鸡的故事。大门口来了一个卖小鸡的商贩,孩子们见小鸡可爱,吵着要买,商贩见孩子喜欢,就觉得奇货可居,肆意抬价。作者讲价不成,于是决定不买,却惹得孩子大哭。作者只得告诉孩子:“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但下面的话他却没说下去,因为下面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1168]这本是最简单的处世哲学,却会破坏孩子的纯真,于是不由得为如何作父亲而感到犹豫、踟蹰而为难。然而,孩子们最终是要走出儿童期这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这又令作者感到悲哀。但不管怎样,要想获得完善的人生,就必须回归到人的天然纯净的本质天性,就算无法达到“空”的境界,也至少要让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接近“真”;这样才能真正享有人生的幸福和快乐。而丰子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季诚性曾经称赞丰子恺说:“一个人的灵魂能够保持住小孩时代的天真、活泼,并不跟着年华的长大而硬化,是可喜的,是值得庆贺的。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丰先生的话,不妨采用‘秋天里的春天’这一句。”^[153]而这“春天”的气质,正是人生的精义所在。

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光达到“空智”的境界是不够的。以弘一法师的主张为核心的佛学思想讲求的是悲智双修。“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佛法是以大菩提心为主的,菩提心就是利益众生的心,学佛法的人应常抱大悲心来做利益众生的事,也就是我们说的行善。而菩提心里又包含了“悲”和“智”,这里的“悲”指的是要救助众苦,而要做到“悲”就必须先具备“智”的品质。“空”和“有”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空依有立,有依空立。“空”与“有”是相合的,“空”存在于“有”的基础上,“有”也以“空”为基础而存在,弘一称此为真空、妙有。“空”并不是学佛的目的,它是亲修实证(有)的方法,因为要先以空破我执,在破除我执后,才能自在无挂碍的去真修实证、做利生的事业(有),并透过真修实证、利生的事业(有),进一步

来体悟“空”的道理^[93]。悲智是同体的,一边用“悲”来体悟“智”,一边用“智”之心行“悲”之事,这样的人生才真正具备了价值。因而信佛行善不是为了果报,不是和佛做交易,而是对自己的心的修持的一部分,以天然的心去行善,才能达到清静平等的“空”的境界。丰子恺正是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了这一观点,他爱护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真情,同情善良,并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作《护生画集》,历经重重坎坷,战乱中,磨难中,尤其是在文革的非人境况中,他都没有放弃。终于,《护生画集》六卷付梓,而丰子恺为之付出的心力,承担的风险,是难以想象的,这决不是他所说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再所不计了”^[97]那么简单,在这里支撑他的,更是佛教普度众生的大悲心肠。智者的达观,学者的热忱,艺术家的敏锐,佛学家的慈悲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台湾作家席慕容在读了《护生画集》第六集后,感慨道“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97]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更是高度评价《护生画集》的意义:“盖所谓护生者,即护心也;亦即维护人生之趋向和平安宁之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发

展及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是故护生画集以艺术而作提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时代,盖觉其需要与迫切。虽曰燭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声绵邈,冀可唤回人类苏醒之觉性。”^[97]丰子恺的护生精神,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至此,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讨论凝聚了丰子恺文思画材的“缘”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了。丰子恺作品的思想核心应该是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讨。而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又因为丰子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事件等等而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面貌。事实上,丰子恺的人生观在思想上可以说是以佛学为总纲,而细微之处又兼有儒学和道家影响的。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影响下对完善的人生态度的追求。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缘”。它虽然不足以概括丰子恺的整个创作,但至少是大部分作品在内容上的精神统帅。谷崎润一郎在评价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时曾写道:“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11280]而凝聚在这些琐碎事物中的神奇的“缘”,大概正是他所谓“不可思议”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丰子恺著.缘缘堂随笔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 [2] 张怀承.无我与涅槃——佛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 [3] 方爱龙.弘一大师新论[M].杭州:西泠印社,2000.
- [4] 王泽应.道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 [5] 钟桂松.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3.

Conditioning Cause—Feng Zikai and Religion

SUN Lian-lian, ZOU Hong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eng Zikai is famous for his pictures, his essays are also very good. But not only his essays but also his pictures, in which we can find a kind of inherent spirit. The spirit is also the center of the system of his works. We can summarize it in one phrase: conditioning cause. It is not only the cause of Feng Zikai's works,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se works. It relates to religion tightly, but not the simple copy of religion in the art and literature. It is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Feng Zikai about the worth of life com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Key words: Feng Zikai; conditioning cause; religion; Buddhism; Taoism; life

[责任编辑:孟青]